

深学深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津派文化大家谈

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基因及新时代创新发展

林 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2月视察天津时提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作为近代中国北方工商业的发源地与重要枢纽，天津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了独特而深厚的工商文化基因，其中既包含合于天下工商发展之道的“崇信重义”价值坚守，又有聚合多元文明共生之境的“海纳百川”包容格局，还有适合时代发展之律的“守正创新”变革勇气，更有符合自我立场与民族大义的“爱国担当”家国情怀。这“四合”文化基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基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挖掘这些基因的时代价值，对于推动津派文化传承发展、实现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崇信重义 | “合于天下”的精神内核

“合”之基石，在于诚信。作为近代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复杂的贸易往来和频繁的资金流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信用体系之上。因此，“崇信重义”始终被视为天津百年工商业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

“崇信重义”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所谓“崇信”，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这一价值理念的传承，又符合现代工商业发展对契约精神的极致追求。“崇信”既是对客户的诚信不欺，也是对伙伴的守信履约，更是对市场规则的内在敬畏。而“重义”则体现了工商业交往中超越利润的价值追求。20世纪初，随着各种银行不断建立与繁荣，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金融作为工商业资金融通的核心枢纽，其有序运转更需超越单纯逐利的价值共识。天津工商业者在与银行业的交往实践中，将“重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具体的行业准则，形成了对“义”的多层诠释：以诚实守信为前提，不逾越底线；强调“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突出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以当时在津设立的中国银行为例，其出纳结算业务等始终以严谨、规范著称，形成了以“铁账本、铁算盘、铁款”为代表的“三铁精神”。

“崇信重义”文化基因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内涵，从传统的诚信为本升级为信用赋能现代化发展模式。天津依托这一基因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天津近年来在食品等重要行业领域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将传统的“口头承诺”转化为可视化、可验证的“数字信用”，既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也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崇信重义”基因还体现在构

建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对诚信企业在行政审批、融资贷款、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本地区“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 海纳百川 | “合于万方”的交往之道

“合”之胸怀，在于开放。“海纳百川”之合，不是被动接纳，而是主动借鉴、消化、再创造。正是基于这种包容胸襟，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格局，始终保持着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换、互动的活力，为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海纳百川”在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基因中首先体现为“中西文明的兼容”。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英法德等国租界的设立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侵略，当然，在客观上也输入了蒸汽机等先进生产技术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宏观层面上，20世纪以来天津远洋运输以及辐射华北的铁路网逐渐发达，作为中西方文明碰撞的成果，有力提升了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极大地推动天津与华北腹地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微观层面上，天津工商业在当时涌现了如范旭东、周学熙、宋则久、宋霖卿、李烛尘等一批实业家，成为民族工业的典范。其次，“海纳百川”的工商文化基因体现为“多元主体共生”的特质。天津作为移民城市，汇聚各地商帮。由于不同商帮有着差异化的经营风格，天津总商会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制定统一行业规范，推动不同商帮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了覆盖棉纺、化工、航运、金融的完整产业体系，使天津在民国时期成为北方经济中心。

在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海纳百川”文化基因逐渐衍生为“协同开放”的新型区域发展范式，构成天津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主动承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在对接“一带一路”中，天津既吸纳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又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将百年前的“通商口岸”升级为新时代的“开放高地”。这不仅延续了天津百年工商业“海纳百川、合于万方”的文化特质，更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逻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创新实践样本。

■ 守正创新 | “合于时代”的发展基因

“合”之智慧，在于应变。“合于时代”的关键动力就在于“守正创新”。这是天津百年工商文化的活力源泉，体现了天津工商业者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推动产业变革的勇气与智慧。

天津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诞生之地”，率先引入电报、铁路等西方技术，中国第一座机器铸币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这诸多“第一”的名号，足以彰显近代天

津在工商业发展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天津工商业者正是以“守正”之心坚守实业报国初心，以“创新”之举突破种种技术封锁，最终实现质的飞跃。在工业方面，永利碱厂创始人范旭东，在当时西方断言“中国不能生产纯碱”的背景下，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最终凭借侯德榜创立的“侯氏制碱法”，于1926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袋纯碱。在商业方面，天津劝业场创始人高星桥坚守“服务民生”的商业本质，在借鉴西方百货公司经营模式基础上，融合天津本土“茶楼、戏院、商铺”的消费场景，推陈出新，改变了传统商业“小而散”的格局，创建现代商业综合体。所谓“劝业”意在“劝吾同胞，业精于勤”。

“守正创新”基因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接“数字赋能”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成为天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天津依托这一基因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同时，在守住科技自立自强底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近年来，天津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飞腾芯片等核心资源，构建“算力+算法+数据”的产业生态，既突破了国外芯片技术垄断，又创新推出新业态，成为天津现代化经济的新增长极。这些既传承了天津百年工商业发展的基因，又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战略发展方向。

■ 爱国担当 | “合于自我”的坚定立场

“合”之境界，在于担当。天津工商文化的“合”基因，最高层次就在于爱国担当的家国情怀。这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家国担当。

“爱国担当”源于天津“卫城”之文化底色。天津城的建立源于河海漕运，并与北京建都紧密相关。特别是北京建都后，历代王朝都要从南方航运大批漕粮以维持生计。而无论海漕还是河漕，基本上都要经由直沽转运。这便是天津城拱卫都城的传统底蕴，也奠定了天津百年工商业“爱国担当”文化基因的基础。

“爱国担当”凸显于近现代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时期。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之殇的天津城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尽管战争之痛犹在，但天津在抵御外敌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卫”作用，足见“卫城”保家卫国的爱国传统。商业先导宋则久于1913年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所，提倡“售卖国货”，旨在以商业振兴民族工业。创办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宋霖卿推出“抵羊”毛线，意在“抵制洋货”、实业救国。天津工商业者捍卫经济自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的行动，成为近代中国抵御外侮的独特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工商业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一

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韩 阳

了空间失序。因此，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强化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性、原真性保护，统筹推进腾退搬迁、违法建设整改与环境整治。通过还原历史空间格局，妥善处理古与今的时空对话、点与面的结构关系，推进从“碎片保护”向“整体传承”转变，让古城肌理在新时代城市发展中焕发光彩。

三、赓续在地文化基因，涵养弘扬历史空间场域的精神原真性

一个地方的魅力不在于一成不变，而是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原真性得以保留与传承。原真性不仅是一种城市物理空间的属性，更是一种赋予人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的权利象征。它蕴含于城市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寸土地，也体现在城市内部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之中，是日常体验逐步累积而成的独特价值。在文旅融合背景下，越来越多城市将原真性作为文化品牌塑造的核心维度，一批依托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新型文化空间脱颖而出。与之相比，以往一些古城镇在更新过程中将原住居民迁出，引入外来商业业态，看似实现了环境整治与功能升级，实则陷入“迪士尼化”的治理窠臼，造成在地文化疏离与城市意象同质化。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人与在地文化的活态共生，使建筑文化遗产不仅是热门打卡的背景板，而是深度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在人们的“日用而不觉”中实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同

时，保持原真性并不意味着对建筑一动不动，相反，建筑作为持续更新的生命体，应基于现代使用环境进行必要的水电、温控等配套设施建设，让历史建筑更好地适应当代生活，滋养在地文化的延续与新生，真正实现在动态发展中守护城市的历史根脉与人文魅力。

四、激活遗产社会功能，推进原真性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是城市历史的实物见证，更是涵养城市文化、延续文脉基因的重要资源。科学利用并开发这种原真性，有助于拓展城市记忆的深度与广度，推动传统城市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多地探索将原真性要素有机融入现代城市空间，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天津在地铁4号线东南角站建设中，原址原位保留了一段明清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使其成为地下空间中可触可感的“城市原点”，为市民提供了与历史对话的独特场域，充分彰显了文化遗产在现代基础设施中的文明价值。同时，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还体现为其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符号——中原之雄浑、江南之秀逸、西北之质朴，皆以独特的建筑语言传递着地方文化的深层含义。对这些原真性符号的提炼转译，不仅能够增强建筑的文化识别度，更可赋予现代空间以历史温度与美学厚度。天津当代建筑中西融合的美学风格即为一例，既传承了城市文脉，又拓展了文化遗产的当代影响力，助力打造“海河相映、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名城。面向高质量城市更新，应在重要公共建筑设计中有机融入本地标志性历史建筑的原真性元素，规避“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倾向，塑造具有中华美学和时代风格的城市特色风貌，为实现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四个以文”研究专项课题“城市更新视角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量发展新阶段，应坚持“一筑一策”的科学路径，针对每处建筑的历史价值、结构状况进行审慎评估。无论是古代木构建筑还是近现代建筑，在修缮时不仅要保留其主体结构 and 立面风貌，还要重视保存如琉璃装饰以及同期门窗、五金等富含工艺价值与时代特征的构件，确保传统材料和工艺介入时遵循“可识可逆”原则，从而维系建筑整体的历史意蕴、空间质感与时间层次。唯有深入贯彻原真性保护理念，系统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原始构件档案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能留尽留、应保尽保，让历史建筑在城市有机更新中既守住文化之魂，又焕发时代之新。

二、尊重历史空间格局，完整延续城市文脉的结构原真性

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体现在单体建筑的形制、材料与工艺上，更深刻蕴含于建筑群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整体格局之中，是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尤需超越“重单体、轻环境”的传统思维，将保护视野拓展至街区乃至城市层面，注重维系建筑与街巷、院落与城郭之间的有机联系。许多古城虽历经变迁，部分房屋或经翻新重建，但其主体建筑间的空间方位与街巷脉络得以延续，如福州“三坊七巷”、开封“七角八巷”，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街角巷陌，承载着城市千百年演进的空间记忆，与文保单位共同构成完整、可读、有温度的历史风貌整体。一旦这种空间肌理遭到割裂或破坏，历史建筑便从有机网络中被剥离，连贯的空间叙事与文化语境便随之断裂。此外，部分历史建筑因长期被单位或居民分据占用，原有格局被改变，进一步加剧

